

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水平的地区差异、 分布动态及收敛性研究

叶菁菁¹

(暨南大学, 广州 510000)

【摘要】: 基于熵权法计算中国各省份消费升级指数, 揭示中国消费升级水平地区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2001-2018 年期间, 全国消费升级水平呈上升趋势, 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由东向西依次递减; 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尤其是东-西部地区间消费升级水平差距较大; 全国及东、西部区域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梯度特征明显; 全国及三大区域均存在 σ 收敛与 β 收敛, 西部地区 β 收敛速度最快, 中部地区次之, 东部地区最慢。

【关键词】: 消费升级 地区差异 分布动态 收敛性

【中图分类号】: F0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912(2021)04-0012-15

一、引言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以投资型和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冲击, 逐渐演变为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 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由 2008 年的 45.7% 上升到 2019 年的 57.7%, 已经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目前我国“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 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可见, 消费增长已成为当前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消费增长既表现为量的增加, 也体现为消费结构升级。简单消费量的增加难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 只有消费升级才能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 提升居民消费欲望, 刺激经济稳定增长。因此, 消费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1]。

从现有研究进展来看, 国内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研究消费升级。其一, 测度消费升级并检验中国消费升级状态。现有学者对消费升级的定义并未达成一致, 多从消费结构升级角度考量, 表现为从“物质”到“服务”的提升, 或者遵从“生存—发展—享受”的消费优化路径。学者利用拓展性线性支出模型或者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2, 3], 将中国八大类消费品依据需求收入弹性划分为普通消费品和高层次消费品或者基本与非基本消费品^[4, 5, 6, 7], 通过计算并比较各自占比的大小以及变动趋势来判断当前中国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研究发现, 目前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过程中; 其二, 探讨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当前, 学者主要从收入差距、不确定性、人口年龄结构、医疗保险、互联网、产业创新、家庭负债、社会学习、数字金融、家庭资产等方面^[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利用宏观数据或者微观数据展开分析, 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如刘悦等基于奢侈品消费角度研究收入不平等对消费升级的影响^[18]。研究发现, 降低收入不平等可以有效提高高收入需求弹性商品的需求, 进而促进消费升级; 姚玲珍和张雅琳发现金融素养水平提高显著促进了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消费^[19], 有利于消费升级。

作者简介: 叶菁菁(1990-), 女, 河南平顶山人,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家庭金融。

科学、全面、系统测度消费升级是研究消费升级的基础。现有学者多基于消费结构模型从消费结构升级角度对其进行定义与测度，忽略了消费升级的其它方面。孟慧霞和陈启杰(2011)认为消费需求是由消费主体、消费客体与消费条件三个要素构成的系统，故在研究消费结构升级时，应兼顾消费的主体结构、客体结构和条件结构三大要素，将消费的内容、形式纳入研究范畴，并考察其互相配合、互相作用的方式^[20]。牡丹清(2017)认为消费升级包括三个层次的升级，分别为消费对象升级、消费方式升级以及消费制度与观念的改变^[12]。其中，前两个方面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最后一个层次不仅包含消费者角度，而且也包括了制度与环境因素。遗憾的是，这些学者仅从定性的角度探讨了消费升级，并未从定量角度对消费升级进行测度。

消费结构升级取决于系统各要素及其子系统的整体关联^[20]，单一从消费客体角度测度消费结构升级，忽略消费主体、消费环境等方面的作用，结论难免有所偏颇。因此，在测度居民消费升级时不仅要从小消费结构升级层面入手，也要考虑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方式、消费环境的升级，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反映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的真实现状。另外，鉴于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存在较大差异，故三大区域消费升级发展水平也可能存在较大差距。较大的区域间差距势必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消费者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故研究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地区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性特征显得尤为重要。其不仅能够从理论层面丰富消费升级相关研究，而且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基于中国2001—2018年31个省份数据，在构建消费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熵权法计算得到各个省份历年消费升级指数，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消费升级水平的地区差异性和分布动态演进，同时使用变异系数和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中国消费升级水平收敛性特征。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第一，基于已有学者的研究，尝试从地区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消费内容升级、消费能力升级、消费模式升级以及消费环境升级等五个维度构建消费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计算得出各省份历年最终消费升级水平指数，以期更加全面、真实反映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现状；第二，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从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两个方面考察中国消费升级地区差异、分布动态以及其演进进程。其中，Dagum基尼系数分解不仅能够测算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区域内差距，而且其可将消费升级水平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区域内以及超变密度三个部分以便于探究总体差异来源。Kernel密度估计法用以研究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动态演进，进一步刻画中国消费升级水平分布动态规律；第三，利用变异系数检验中国消费升级水平的 σ 收敛特征，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中国消费升级水平 β 收敛性，以验证既有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二、研究设计

(一)消费升级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认为消费升级涵盖了消费总量的增加、消费结构的优化、消费品质的提升、消费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消费环境的优化等多个范畴。借鉴苏宁金融研究院联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PP财经联合发布《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指数报告(2018)》¹的构建方法以及考虑到数据可得性，²本文选取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消费内容升级、消费能力升级、消费模式升级以及消费环境升级等5个一级指标、39个二级指标，通过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进而获得各个省份历年最终消费升级指数，以期从多个维度来评估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现状。表1罗列了消费升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级指标名称及其计算方法。

表1 消费升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指标权重(ω)
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	0.020
	消费率占比	居民消费水平/地区生产总值	+	0.020
	第三产业从业者数量	第三产业从业者数量对数	+	0.011

消费升级		人均消费支出	居民消费支出/地区年末人口	+	0.038	
		人均家庭设备及服务消费支出	-	+	0.035	
		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	-	+	0.043	
	消费内容升级		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	+	0.029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	+	0.026
			人均其他消费支出	-	+	0.046
			发展型消费占比	(家庭设备及服务消费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总消费支出	+	0.021
			享受型消费占比	(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其他消费支出)/总消费支出	+	0.007
			消费结构升级	生存型消费占比 X1+发展型消费占比 X2+享受型消费占比 X3	+	0.008
			恩格尔系数	人均食品支出/人均消费支出	-	0.008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年末人口数	+	0.021
			汽车拥有量	私人汽车拥有量	+	0.040
	消费能力升级		收入增长率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	0.014
			工资水平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对数	+	0.041
			城乡消费水平对比	-	-	0.012
			高等教育学生人数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对数	+	0.026
			就业人员文化水平	就业人员中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就业人员占比	+	0.057
			就业保障能力	城镇登记失业率	—	0.021
	消费模式升级		邮电业务总量	-	+	0.009
			人均快递总量	快递总量/地区年末人口数	+	0.106
			国内游客	旅行社接待国内游客人数对数	+	0.013
			移动通讯手机持有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对数	+	0.008
			低碳消费	城市燃气普及率	+	0.012
	消费环境升级		城市建设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GDP	+	0.027
			工业化水平	第二产业/GDP	+	0.010
			互联网发展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对数	+	0.011
			邮政业营业网点	人均邮政业营业网点	+	0.031
			公路里程	-	+	0.012
			铁路营运里程	-	+	0.012
			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	+	0.032
		旅行社个数	-	+	0.010	
		卫生医疗	人均卫生医疗机构数量	+	0.035	
		社会保险参与人数占比	(年末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年末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地区年末人口数	+	0.032	
	社会保障状况	人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	0.046		

	外商直接投资	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数	+	0.012
	金融发展水平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	0.035

(二)研究方法

1. 熵权法。

熵权法是对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中各基础指标进行相对较为客观赋权的一种方法，其因避免人为赋权过程中的主观性得到诸多学者的青睐。本文借鉴张卫民等(2003)、邓宗兵等(2020)等学者的做法^[21, 22]，采用熵权法计算各个指标的熵值和权重，并将其加总计算得到最终各省份历年消费升级评价指数。指数越大，省份消费升级水平也就越高。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数据标准化。所选取的指标涵盖了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其标准化的公式分别为：

正向指标标准化：

$$x'_{ij} = \frac{X_{ij} - X_{j\min}}{X_{j\max} - X_{j\min}} \quad (1)$$

负向指标标准化：

$$x'_{ij} = \frac{X_{j\max} - X_{ij}}{X_{j\max} - X_{j\min}} \quad (2)$$

其中， x_{ij} 则为省份 i 第 j 个指标值， $i=1, 2, 3, \dots, m$ ， $j = 1, 2, 3, \dots, n$

第二，确定指标权重。

首先，计算省份 i 第 j 项指标比重：

$$P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quad (3)$$

其次，计算 j 指标熵值为：

$$e_j = -k \sum_{i=1}^m P_{ij} \ln P_{ij} \quad , k > 0, k = 1 / \ln m \quad (4)$$

最后，指标 j 权重计算公式为：

$$w_j = \frac{1 - e_j}{\sum_{j=1}^n 1 - e_j} \quad (5)$$

第三，计算指标综合得分为：

$$S_i = \sum_{j=1}^n w_j P_{ij} \quad (6)$$

2.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相比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传统测量不平等的指标，Dagum 基尼系数测算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基尼系数不能按子样本群进行分组测算的局限，而且解决了样本数据交叉重叠问题以及区域差异来源的问题^[23]。Dagum 测算可以将不平衡分解为区域间不平衡、区域内不平衡以及超变密度，超变密度表示为由于地区间的重叠所引起的不平衡，这为考察消费升级不平衡来源提供重要便利。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式(7)~式(17)所示。

$$G = \frac{\sum_{j=1}^k \sum_{h=1}^k \sum_{i=1}^{n_j} \sum_{r=1}^{n_h} |y_{j\bar{i}} - y_{hr}|}{2n^2\mu} \quad (7)$$

$$G = G_w + G_{nb} + G_t \quad (8)$$

$$\mu_h \leq \mu_j \leq \dots \leq \mu_k \quad (9)$$

$$G_{\bar{j}} = \frac{\frac{1}{2\mu_j} \sum_{i=1}^{n_j} \sum_{r=1}^{n_j} |y_{ji} - y_{jr}|}{n_j^2} \quad (10)$$

$$G_w = \sum_{j=1}^k G_{\bar{j}} p_j s_j \quad (11)$$

$$G_{\bar{h}} = \sum_{i=1}^{n_j} \sum_{r=1}^{n_h} |y_{j\bar{i}} - y_{hr}| / n_j n_h (\mu_j + \mu_h) \quad (12)$$

$$G_{nb} = \sum_{j=2}^k \sum_{h=1}^{j-1} G_{\bar{h}} (p_j s_h + p_h s_j) D_{\bar{h}} \quad (13)$$

$$G_t = \sum_{j=2}^k \sum_{h=1}^{j-1} G_{\bar{h}} (p_j s_h + p_h s_j) (1 - D_{\bar{h}}) \quad (14)$$

$$D_{\bar{h}} = \frac{d_{\bar{h}} - p_{\bar{h}}}{d_{\bar{h}} + p_{\bar{h}}} \quad (15)$$

$$d_{\bar{h}} = \int_0^\infty dF_j(y) \int_0^y (y-x) dF_h(x) \quad (16)$$

$$p_{\bar{h}} = \int_0^\infty dF_h(y) \int_0^y (y-x) dF_j(x) \quad (17)$$

其中, 式(7)用于计算总体基尼系数;式(8)将总体基尼系数分解为区域内差异贡献(G_w)、区域间差异贡献(G_{wb})以及超变密度贡献(G_c);式(9)是根据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均值对其进行排序;式(10)与式(11)表示地区 j 区域内基尼系数与区域内差异贡献;式(12)与式(13)表示地区 j 与地区 h 区域间基尼系数与区域间差异贡献;式(14)表示子群中超变密度的贡献; $y_{ji}(y_{hr})$ 表示 $j(h)$ 地区内第 $i(r)$ 个省份的消费升级水平; μ 表示全国各省份消费升级指数平均值; n 表示省份个数; k 表示为地区划分的个数; $n_j(n_h)$ 是第 $j(h)$ 地区内省份个数; $p_j=n_j/n, s_j=n_j \mu_j/n \mu; D_{ij}$ 为地区 i 与地区 j 之间消费升级水平的相对影响, $1-D_{ij}$ 为超变密度; $F_j(F_h)$ 为 j_h 区域的累计分布函数; d_{jh} 为地区 j 与地区 h 之间消费升级水平的差值, 即地区 j 与地区 h 中所有 $y_{ji}-y_{hr}>0$ 的样本值加总的数学期望。同理, p_{jh} 为地区 j 与地区 h 中所有 $y_{hr}-y_{ji}>0$ 的样本值加总的数学期望。

3.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作为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 其因模型依赖性弱和稳健性强的特点, 成为诸多学者用于分析空间非均衡性的常用方法。该方法通常假定随机变量 x 的密度函数为:

$$f(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_i - x}{h}\right) \quad (18)$$

其中, N 指代观测值数量; X_i 指代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 x 表示平均值; K 表示核密度; h 为带宽。此外, 核密度作为一种加权函数或者平滑转换函数, 通常还需要满足:

$$\begin{cases} \lim_{x \rightarrow \infty} K(x) \cdot x = 0 \\ K(x) \geq 0 & \int_{-\infty}^{+\infty} K(x) dx = 1 \\ \sup K(x) < +\infty & \int_{-\infty}^{+\infty} K^2(x) dx < +\infty \end{cases} \quad (19)$$

常用的核函数包括很多类, 本文这里主要采用高斯核函数对消费升级水平进行估计分析。带宽的选择对核函数估计非常重要, 带宽过大, 所估计的核函数密度图形越光滑, 反之带宽越小, 核函数密度突显也不光滑, 但其精准度越高。本文主要从核密度估计曲线图像分布位置、形态、延展性三个方面对消费升级评价指数进行分析。

4. 收敛机制。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消费升级水平地区差异的演变趋势, 本文主要从 σ 收敛和 β 收敛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其中, σ 收敛主要考察消费升级存量水平特征, 而 β 收敛主要侧重于考察消费升级水平增量, 具体检验方法如下:

第一, σ 收敛检验方法。 σ 收敛可以理解为不同地区消费升级水平的离散程度随时间推移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反映变量离散程度的统计性指标有很多, 本文借鉴梁红艳(2018)^[24]采用变异系数进行计算, 相关公式为:

$$\sigma_j = \frac{\sqrt{\sum_i^{N_j} (CUI_{ij} - \overline{CUI_j})^2 / N_j}}{\overline{CUI_j}} \quad (20)$$

其中, $j(j=1, 2, 3)$ 表示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 $i(i=1, 2, 3, \dots, 31)$ 表示三大区域内所含省份; N_j 表示第 j 个区域内省份数量; CUI_{ij} 表示 j 区域内 i 省份消费升级水平评价指数; $\overline{CUI_j}$ 表示 j 区域内 i 省份消费升级水平评价指数均值。

第二, β 收敛检验方法。 β 收敛主要从增长率的角度探讨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趋于一致稳态, 当消费升级水平呈现 β 收敛时, 不同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增长速度趋同, 具体表现为消费升级水平落后地区会因更高的增长率逐步赶上发达地区, 两者差距逐渐缩小, 最终趋于一致的稳态水平。 β 收敛分为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 前者不考虑地区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而条件 β 收敛是指在控制一系列地区发展因素后的收敛态势。绝对 β 收敛计量模型为:

$$\ln\left(\frac{CUI_{i,t+1}}{CUI_{i,t}}\right) = \alpha + \beta \ln CUI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1)$$

其中, $CUI_{i,t+1}$ 表示 i 地区 $t+1$ 期的消费升级水平评价指数; $CUI_{i,t}$ 表示 i 地区 t 期的消费升级水平评价指数; $\ln(CUI_{i,t+1}/CUI_{i,t})$ 表示 i 地区消费升级水平评价指数在 $t-t+1$ 时间跨度内的增长率; α 为常数项; β 为待估参数。若 $\beta < 0$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则消费升级水平初始评价指数数值与其增长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存在绝对 β 收敛, 其收敛速度可表示为 $\lambda = -\ln(1+\beta)/T$, T 为时间阶段。反之, 则消费升级水平评价指数是发散的, 不存在绝对 β 收敛; μ_i 和 η_t 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基于绝对 β 收敛计量模型的基础, 加入诸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率、消费信贷等一系列地区变量因素, 使得模型估计结果更精准, 更具有说服力, 条件 β 收敛计量模型为:

$$\ln\left(\frac{CUI_{i,t+1}}{CUI_{i,t}}\right) = \alpha + \beta \ln CUI_{i,t} + \lambda Control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2)$$

其中, λ 为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 $Control$ 为影响消费升级供给水平增长率变化的一系列变量; 其他变量同上。

(三)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变量说明。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就越高^[25], 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更加全面, 家庭消费的信心与意愿也就越高, 越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26], 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尽管在衡量消费升级指数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这里将其再次作为控制变量对整体影响不大, 故本文将将其纳入控制变量范畴。其次, 收入与消费水平密切相关, 收入水平越高, 居民消费意愿就越高, 越有利于提升消费结构, 促进消费升级。鉴于各省份收入与人口的差异以及我国对居民收入数据统计口径的差异, 本文选取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居民收入情况, 具体测算公式为: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times 城镇人口 +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需要说明的是,2013年以前并未统计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里本文将使用农村人均纯收入进行替代。收入与消费高度相关,但消费对收入冲击反应存在很大异质性,易形成消费差距,不利于消费升级^[27]。韩立岩和杜春越(2012)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抑制居民消费^[28]。李江一和李涵(2016)从相对收入理论视角进行检验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挤出了农村家庭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但提高了城镇家庭享受型消费支出^[29]。因此,在研究消费升级时,不仅要考虑居民整体收入变化,也要考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借鉴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的计算方法,将城乡收入差距定义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30]。然后,徐敏和姜勇(2015)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提高了城乡劳动力报酬,而且解决了“物质匮乏”的窘境,进而提升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与能力^[31]。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也是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可表示为 $q_1 \times 1 + q_2 \times 2 + q_3 \times 3$, q_1, q_2, q_3 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再者,城镇化也是影响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付波航等(2013)发现城镇化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习惯、扩展消费领域等途径间接地提高了总体消费水平^[32]。本文使用各省份城镇人口与地区总人口之比作为其城镇化水平代理指标。最后,根据流动性约束假说理论可知,流动性约束提升了居民储蓄率,抑制了家庭消费。而消费信贷作为缓解流动性约束的重要方式,其对提升家庭消费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3]。臧旭恒和李燕桥(2012)发现消费信贷缓解了当期居民流动性约束,促进了家庭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的增长^[34]。本文选取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衡量地区消费信贷水平。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样本为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所涉及的指标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部分缺失数据主要通过查找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获得。文中所涉及的货币数值型指标数据均以2001年为基期,并依据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平减处理。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558	9.915	0.720	7.953	11.51
LNPCDI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	558	8.939	0.757	7.410	12.30
URIG	城乡收入差距	558	2.914	0.606	1.845	5.605
ISU	产业结构升级	558	2.315	0.133	2.069	3.220
UR	城镇化率	558	0.496	0.154	0.139	0.896
LNCI	消费贷款对数	558	8.901	1.194	4.570	11.53

三、典型事实分析

本文基于熵值法计算消费升级评价指数并绘制了2001—2018年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演变趋势图,如图1所示。不难看出,样本观测期内,全国消费升级水平平均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存在区域差异性。首先,从演变趋势来看,全国及三大区域样本期内消费升级水平演变趋势极为相似,全国以及中部与西部地区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整体呈轻微下降趋势,且全国与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均存在阶段性差异。2001—2007年期间,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2008—2014年期间,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15—2018年,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但2017年之后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再次回升。其次,从变动幅度来看,样本观测期内,全国及东部、中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变动幅度不大,而西部地区变动较大。其中,全国消费升级水平指数由2001年0.307上升到2018年0.332,涨幅约为7.94%;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由2001年0.428下降到2018年0.423,降幅约为1.10%,但2001—2017年

期间,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涨幅约为 8.87%,高于全国层面涨幅;中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由 2001 年 0.246 上升到 2018 年 0.270,涨幅约为 9.36%,高于全国层面上涨幅度;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由 2001 年 0.237 上升到 2018 年 0.289,涨幅约为 21.93%,远远高于全国层面上涨幅度。最后,从数值大小来看,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指数均值分别 0.323、0.446、0.267、0.247。可见,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均值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低于全国水平,且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即地区间消费升级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这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对外开放度高、社会保障范围更全面、消费环境更便利、居民收入水平更高,故其消费意识与意愿也就更强,整体消费升级水平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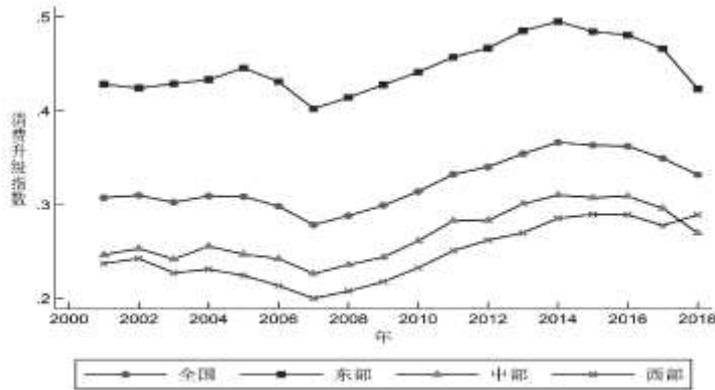


图 1 2001~2018 年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演变趋势

四、基尼系数分解

上文描绘了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的动态演变过程,本部分将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分解法进一步探究中国消费升级水平的总体差异大小及其差异来源。

(一)总差异

图 2 绘制了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样本观测期内,中国消费升级水平相对差异逐步缩小。首先,从消费升级水平总体基尼系数演变趋势来看,样本观测期内全国消费升级水平整体相对差异呈下降趋势,且基尼系数介于 0.156—0.235 之间浮动,变动幅度不大。分阶段来看,全国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经历了“上升—缓慢下降—大幅度下降”的演变过程。具体来看,2001—2005 年期间全国消费升级水平相对差异整体以“W”型向上上升,而到 2006—2008 年期间,其上升速度变缓,2006 年全国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达到样本观测期内最大值 0.235。2009—2018 年期间,全国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 2017 年之后全国消费升级基尼系数出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尽管 2017 年全国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值有所回升,但其并未影响整体下降趋势。其次,从下降幅度来看,全国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由 2001 年的 0.215 下降到 2018 年的 0.156,降幅约为 27.16%。其中,2008—2018 年期间,全国消费升级基尼系数数值下降幅度约为 33.59%。2008 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为了刺激经济,降低金融危机所带来隐患,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如四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尽管该项政策存在诸多后续问题,但当下确实刺激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也做出重要贡献。四万亿投资计划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企业投资积极性,提升了居民收入与消费者信心,刺激消费者消费需求,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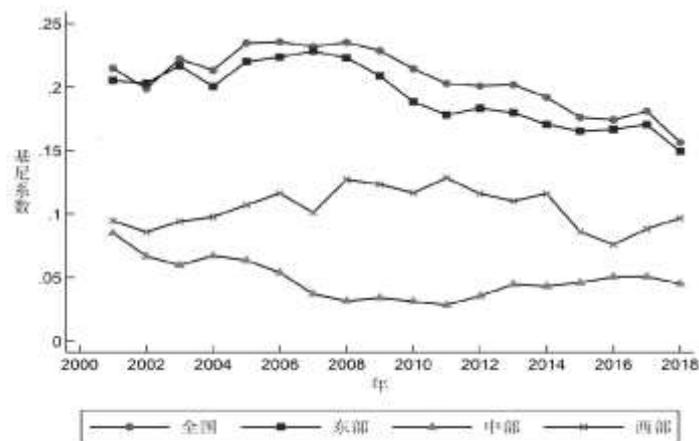


图2 消费升级区域内差异演变趋势

(二) 区域内差异

图2还绘制了中国三大区域内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演变趋势,各地区表现迥异。首先,从演变趋势来看,样本观测期内,三大区域基尼系数演变趋势迥异,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而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整体呈轻微上升趋势。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演变过程与全国基尼系数演变趋势比较相似,只不过2001—2007年东部地区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之后才开始逐步回落。中部地区差异比较大,2001—2011年,中部地区整体呈下降趋势。2012—2016年逐步上升,2017年又开始逐步回落。西部地区整体呈上升趋势,2001—2008年期间,西部地区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尽管2007年有所回落,但影响不大。2009—2016年期间,西部地区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14—2016年期间,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比较大。2017—2018年期间,西部地区消费升级基尼系数呈现扩大趋势。其次,从变化幅度来看,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由2001年的0.205下降到2018年的0.149,降幅约为27.22%。中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由2001年的0.085下降到2018年的0.045,降幅约为47.13%。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由2001年的0.095上升到2018年的0.097,涨幅约为2.32%。其中,2001—2016年期间,西部地区消费升级基尼系数下降幅度约为19.57%。最后,从三大区域基尼系数值来看,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均值分别为0.193、0.049、0.105,即东部和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值整体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基尼系数均值约为西部地区两倍,中部地区四倍。总的来看,东部地区内部消费升级水平不均衡现象最为突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区域内各省份消费升级水平差距过于悬殊。根据东部地区各省份消费升级指数大小发现,消费升级指数最高的地方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其消费升级指数分别为0.754、0.680、0.513,而排名最低的三个省份分别为福建、河北、海南,其消费升级指数分别为0.339、0.298、0.207。其中,消费升级指数最高的省份约是消费升级指数最低省份的3.6倍。同样,西部地区内部差距也相对较为严重且存在微弱扩大趋势,其中消费升级水平较高的省份分别为四川、内蒙古与重庆,其消费升级指数均值分别为0.314、0.295、0.291,消费升级指数均值最低的省份为甘肃、贵州与西藏,相对应的消费升级指数均值为0.212、0.194、0.185,消费升级指数最高的省份约是消费升级指数最低省份的3倍,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弱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各省份消费升级指数差距相对较小,各个省份消费升级指数均值介于0.240—0.2297之间,表现更为均衡。

(三) 区间差异

图3绘制了三大经济区域两两区域间消费升级指数相对差异的演变趋势,由图3可知,东—西部地区间消费升级水平相对差异最大且呈缩小趋势,而中—西部地区间消费升级水平相对差距呈微弱扩大趋势。首先,从演变趋势来看,东—中部和东—西部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整体呈上涨趋势。具体来看,2001—2005年期间,东—中部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变动趋势呈“W”型向上。2006—2016年期间,其开始呈明显下降

趋势，但 2017 年之后又呈现微弱回升态势。东—西部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趋势图与东—中部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趋势图相似，但东—西部区域间基尼系数是从 2007 年开始出现递减趋势，且 2017 年之后，东—西部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出现大幅下降趋势。相反，中—西部地区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相对差距整体呈现明显扩大态势。2001—2006 年期间，中—西部地区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相对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2007—2015 年期间，这一扩大趋势得到遏制，中部和西部地区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逐渐缩小，尽管 2011 和 2013 年出现回升趋势，但对整体影响不大。但 2016 年之后，两区域间相对差距再一次出现扩大趋势。其次，从变动幅度来看，东—西部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均值下降幅度最大。其中，东—西部地区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由 2001 年的 0.145 下降到 2018 年的 0.095，降幅约为 34.48%。东—中部地区组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由 2001 年的 0.126 下降到 2018 年的 0.105，降幅约为 16.67%。中—西部地区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由 2001 年的 0.009 上升到 2018 年的 0.017，涨幅约为 88.89%。最后，从数值差异来看，东—中部、中—西部、东—西部消费升级基尼系数均值分别为 0.118、0.021、0.146。显然，东—西部地区间基尼系数最高，东—中部次之，中—西部地区间基尼系数最小。不过，2018 年时，东—西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第一次出现小于东—中部区域间基尼系数。尽管中—西部区域间消费升级基尼系数比较低，但其存在轻微扩张趋势，而东—西部和东—中部区域间基尼系数在动态中缓慢缩小。中—西部区域间相对差距的日渐扩大，不利于全国各个区域协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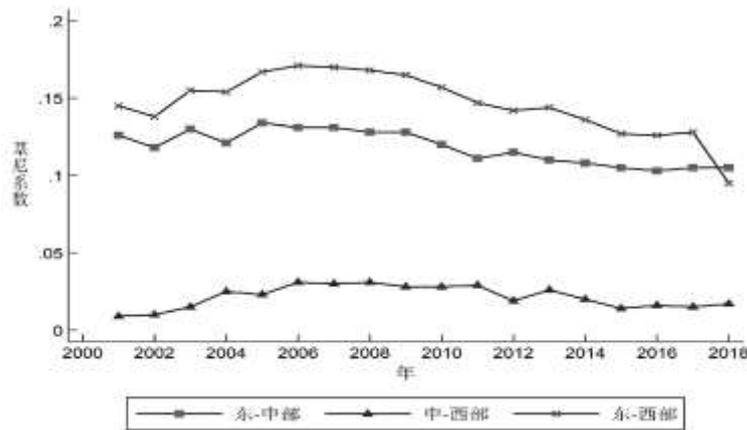


图 3 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相对差距演变趋势

(四) 差异来源与贡献

图 4 绘制了观测期内全国消费升级水平相对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的演变趋势，不难发现，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相对差距是全国消费升级水平总差异的主要来源。首先，从差异来源的演变趋势来看，样本观测期内，区域间相对差异、区域内相对差异及超变密度波动较小，且区域间相对差距和区域内相对差距对整体相对差距贡献率呈微弱上升趋势，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整体呈下降态势。具体来看，2007 年之前，区域间相对差异对总体相对差异的贡献率小幅上涨，2008 年之后逐年下降。尽管 2010 年、2015 年出现轻微反弹趋势，但并未影响整体变动趋势。区域内相对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在观测期内变化微弱，相对稳定，2018 年出现上升趋势。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经历了“下降—上升”的变化过程。2007 年之前，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逐年下降趋势，2008 年之后开始反弹上升，但仍未高于 2001 年的贡献率。其次，从变动幅度来看，区域间相对差异贡献率从 2001 年 66.43% 上涨到 2018 年 66.51%，涨幅约为 0.13%，区域内相对差异贡献率从 2001 年 23.98% 上涨到 2018 年 24.99%，涨幅约为 4.21%，超变密度贡献率从 2001 年 9.59% 下降到 2018 年 8.50%，降幅约为 11.39%。可见，区域间相对差异和区域内相对差异对全国消费升级水平总体相对差异的影响逐渐增强。最后，从贡献率数值大小来看，区域间相对差异对全国消费升级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远远高于区域内和超变密度，是全国消费升级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具体来看，区域间、区域内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均值分别为 69.52%、23.48%、7.00%。可见，区域间相对差异在全国消费升级总体差异中占比最大，是最主要的来源，其次为区域内相对差异，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贡献率最小，故中国消费升级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之间

消费升级水平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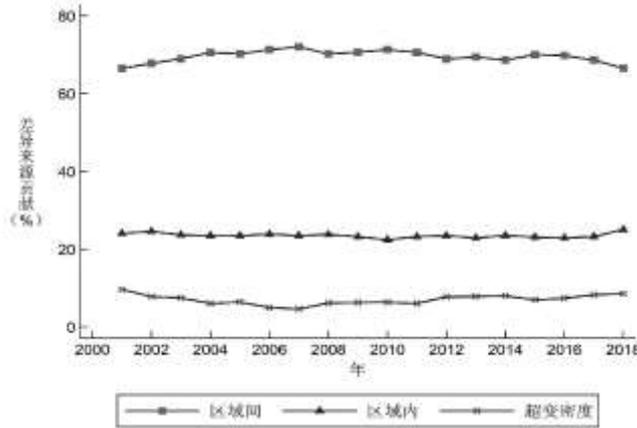


图 4 消费升级水平总体相对差异来源贡献演变趋势

五、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分布动态

为了更详细地观察消费升级水平的绝对差异，本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进一步考察全国整体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消费升级水平的分布位置、形态与延展性分布动态特征，详细信息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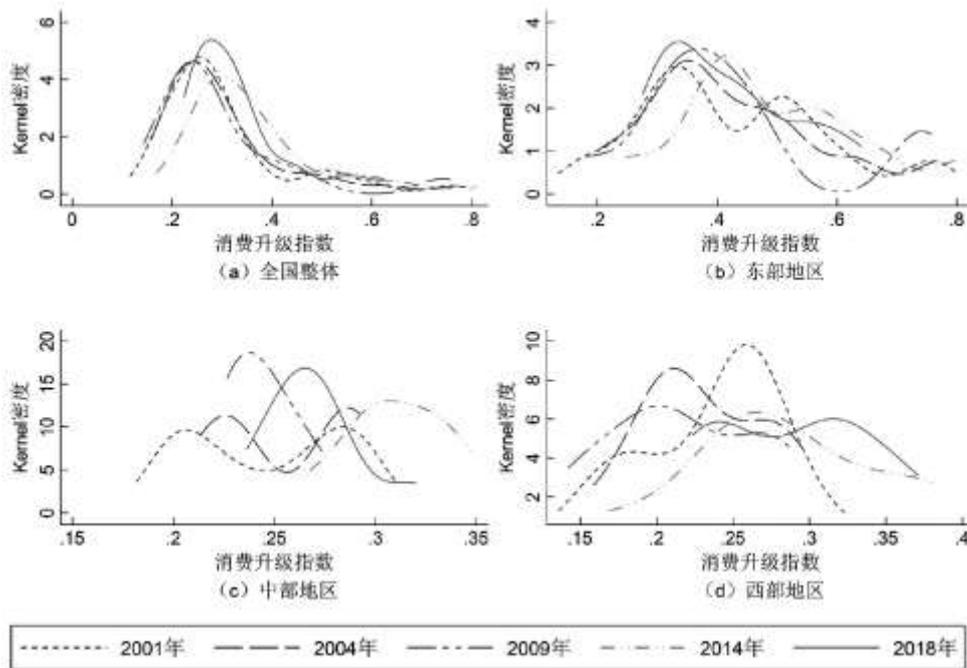


图 5 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分布动态演进

(一) 全国整体层面

图 5 左上角 (a) 绘制了全国层面消费升级水平的分布动态趋势。不难看出, 全国总体消费升级水平在样本期内整体呈上升趋势, 地区内绝对差异逐步缩小, 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首先, 从分布位置来看, 全国总体消费升级水平 Kernel 密度分布曲线中心经历了“左移—右移—左移”变动趋势, 这意味着全国总体消费升级水平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动趋势, 但整体呈上升趋势。其次, 从形态来看, 主高峰峰高呈现“小幅下降—大幅下降—大幅上升”的变动, 且整体向上。波峰宽度明显变窄, 这表明除个别省份消费升级指数较高外, 其他绝大多数省份消费升级指数的绝对差异逐渐变小, 与之前计算的全国基尼系数变动趋势相吻合。波峰数量经历了“多峰—双峰”的演变过程。2001 年, 全国整体消费升级指数分布曲线存在一个主峰和两个较低峰值的侧峰。2009 年开始, 全国整体消费升级指数分布曲线演变为双峰, 存在一个主峰和一个较低峰值的侧峰, 这意味着 2009 年之后全国消费升级指数多极化态势趋于弱化, 但全国消费升级指数仍具有一定梯度效应, 呈微弱的两极分化态势。从延展性来看, 全国消费升级指数分布右侧拖尾明显缩短、抬高, 趋于收敛, 则意味着全国范围内消费升级水平绝对差异逐步缩小。由上述分析可知, 随着时间推移, 我国全国消费升级水平逐步上升, 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多极化现象减弱, 逐步演变为两极化现象, 且全国消费升级水平地区绝对差异整体呈缩小特征。

(二) 三大区域层面

图 5 (b)、(c)、(d) 分别描绘了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指数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由图 5 可知, 中部和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整体提高, 而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呈现微弱下降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绝对差异呈明显下降趋势, 而西部地区内部绝对差距呈微弱扩大趋势。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且西部地区两极分化态势较为严重。首先, 从分布位置来看, 三大区域存在明显差别。样本观测期内, 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指数分布曲线中心存在轻微左移态势, 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布曲线中心表现明显右移态势。可见, 东部消费升级水平总体呈微弱下降趋势,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指数整体呈明显上升趋势, 这之前典型事实分析相吻合。其次, 从分布形态来看, 东部地区分布曲线在观测期内主高峰高度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动趋势, 整体表现为上升。波峰数量由多峰演变为双峰, 存在两极分化现象。2001 年, 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指数 Kernel 密度分布曲线存在一个主高峰和两个侧峰, 其中一个侧峰峰值较高, 另一个侧峰峰值较低。2009 年, 东部地区分布曲线由多峰演变为双峰。东部地区分布曲线函数区域变窄, 表明东部地区内部消费升级水平绝对差异整体呈下降趋势; 中部地区分布曲线在样本观测期内主高峰峰高经历了“大幅上升—大幅下降—大幅上升”的演变, 整体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波峰由宽变窄, 波峰数量由双峰演变为单峰, 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2001 年, 中部地区消费升级指数 Kernel 密度分布曲线包括一个主峰和一个侧峰, 主峰和侧峰峰值相差不大。2009 年, 中部地区分布曲线由双峰演化为单峰, 这意味着中部地区内部消费升级指数绝对差异整体趋于缩小趋势, 且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 Kernel 密度分布曲线在样本观测期内主高峰峰高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波峰呈微弱变宽态势, 波峰数量经历了“双峰—单峰—双峰”的演变。2001 年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指数分布曲线包括一个主峰和一个侧峰, 且侧峰峰值略高。2014 年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指数分布曲线由双峰演变为单峰, 2018 年西部地区分布曲线再度演变为双峰, 且主峰与侧峰峰值相差不大, 这说明西部地区两极分化态势较强。从分布延展性来看, 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右拖尾现象, 但东部地区右拖尾逐渐缩短, 即内部绝对差距逐步降低。中部地区不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 且其延展性区域呈收敛态势, 内部绝对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西部地区也不存在明显右拖尾现象, 且其延展性呈发散态势, 但函数区间收敛, 故其内部绝对差异呈现轻微扩大趋势。

总的来讲, 样本观测期内, 全国及中部、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 而东部地区则呈微弱下降趋势。从绝对差异角度来看, 全国以及东部、中部地区内部绝对差异呈缩小特征, 而西部地区内部消费升级水平绝对差异呈现轻微扩大特征。此外, 全国及东部、西部区域内部呈现两极分化态势, 且西部地区两极分化态势最为严重。

六、收敛性分析

为了更加精准考察消费升级水平时空格局的演变趋势, 本文在该部分利用 σ 、 β 收敛模型进行收敛性检验, 相关结果如下所示。

(一)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的 σ 收敛检验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计算观测期内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 σ 数值,图6根据计算结果绘制了趋势图。首先,从演变趋势来看,全国层面消费升级变异系数在样本观测期内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存在阶段差异性。具体来看,2001—2007年,整体呈上升趋势,尽管2002年、2004年出现小幅下降,但整体影响不大。2007年之后,全国消费升级变异系数开始逐步下降。2001—2018年期间,全国消费升级水平变异系数降幅约为29.75%,而2007—2018年降幅约为39.03%。三大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消费升级变异系数趋势图整体呈下降趋势。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变异系数趋势图与全国层面变异系数趋势图变动极为相似,2001—2007年主要呈上升趋势,而2008—2018年呈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变动幅度较小,2001—2008年,西部地区变异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2009—2013年,该地区变异系数变动幅度比较平稳,2014—2016年呈大幅下降趋势,2017年之后,该地区变异系数值逐步回升。中部地区变异系数趋势图与东部、西部相反,其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变动趋势。2001—2011年期间,中部地区变异系数逐步缩小,2012—2016年,该地区变异系数呈微弱上升趋势,2017年之后,该地区变异系数值有所回落。其次,从变化幅度来看,东部地区变异系数由2001年0.368下降到2018年的0.266,降幅约为27.65%。中部地区变异系数由2001年0.151下降到2018年的0.085,降幅约为43.65%。西部地区变异系数由2001年0.174下降到2018年的0.171,降幅约为1.49%。总的来看,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均存在显著 σ 收敛现象,且中部地区收敛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明显“追赶”态势,未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可能会逐步趋于同一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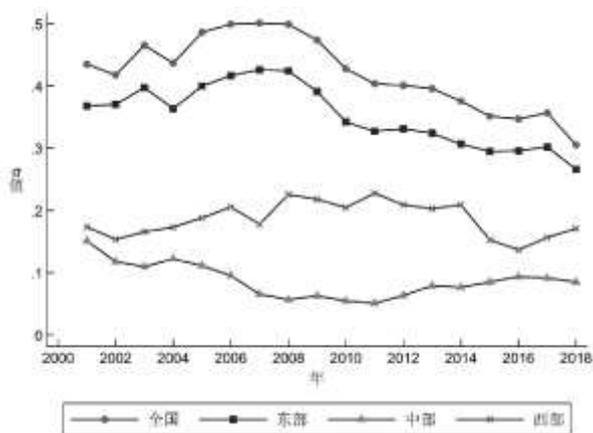


图6 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变异系数演变趋势

(二)全国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 β 收敛检验

1. 绝对 β 收敛分析

汇报了全国以及三大地区消费升级水平的绝对 β 收敛检验结果。根据估计结果可知,在控制省份以及时间固定效应后,全国及三大区域收敛系数 β 值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即全国及三大区域层面消费升级水平均存在绝对 β 收敛,其意味着消费升级水平低的省份的消费升级水平增长速度要快于消费升级水平高的省份,最终趋于同一稳态水平。从三大区域的收敛速度来看,东部、中部与西部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79%、2.34%、2.63%,表明不同区域省份消费升级水平将以不同收敛速度向同一稳态水平逐步趋于一致。其中,西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其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

2. 条件 β 收敛分析

汇报了全国以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的条件 β 收敛检验结果。根据估计结果可知,在加入一些省级控制变量后,全国及

三大区域收敛系数 β 值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 即全国及三大区域层面消费升级水平均存在条件 β 收敛, 这意味着各省份消费升级水平变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各自稳态水平。从三大区域的收敛速度来看, 东部、中部与西部的收敛速度分别为 3.13%、3.51%、3.91%。可见, 西部地区 β 收敛速度最快, 其次为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β 收敛速度最慢。与绝对 β 收敛系数绝对值相比, 全国及三大区域条件 β 收敛系数绝对值变大。可见, 在控制一些地区因素后, 消费升级水平收敛速度也随之发生改变, 消费升级水平收敛速度变得更快。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1—2018 年中国 31 个省份数据, 尝试从地区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消费内容升级、消费能力升级、消费模式升级以及消费环境升级等五个维度构建消费升级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熵权法计算得出各省份最终消费升级水平指数。在考察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演变趋势后, 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方法、Kernal 密度估计方法以及收敛性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全国以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的地区差异、分布动态演进过程以及收敛性特征。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整体来看, 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整体不高, 且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具体来说: 首先, 从消费升级水平大小来看, 全国以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均值分别为 0.323、0.446、0.267、0.247, 消费升级水平由东向西逐步递减, 具有很大上升空间; 其次, 样本期内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变动分阶段性, 2001—2007 年期间, 全国及各地区消费升级水平整体向下, 2011—2014 年期间, 全国及各地区消费升级水平整体呈向上趋势变动, 2014 年之后又开始回落。样本期内, 全国层面以及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 而东部地区整体呈微弱下降趋势。

第二, 从相对差异来看, 全国以及东部、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整体呈下降趋势, 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整体呈微弱上升趋势, 区域间相对差异是构成中国消费升级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具体来说: 首先, 从区域内差异来看, 东部地区内部差异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整体呈缩小趋势, 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整体呈微弱扩大趋势; 其次, 从区域间差异来看, 东—西部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差距最大, 其次为东—中部, 中—西部区域间差距最小, 且在样本观测期内, 东—中部、东—西部区域间消费升级水平差距整体呈下降趋势, 而中—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呈扩大趋势; 最后, 从差异来源看, 中国消费升级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引起的。区域间、区域内以及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分别为 69.52%、23.48%、7.00%, 区域间相对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第一来源。

第三, 从绝对差异来看, 全国以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分布曲线存在明显差异性。具体来说: 首先, 从分布曲线位置来看, 全国层面以及中部、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 Kernel 密度分布曲线中心明显右移, 而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分布曲线中心发生轻微左移现象, 其表明全国以及东部、中部消费升级水平呈上升趋势, 而东部地区呈微弱下降趋势; 从波峰变化来看, 全国以及东部、中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分布曲线波峰明显变高变窄, 而西部地区波峰高度变矮。全国以及东部地区分布曲线均存在一个主高峰和一个较低峰值的侧峰, 但东部地区侧峰不明显。西部地区存在很明显的双峰特征, 且主高峰和侧峰峰值相差不大。这意味着全国以及东部、西部地区均存在两极分化态势, 且西部地区这一现象较为严重; 从延展性来看, 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右拖尾现象, 但其右拖尾逐渐缩短。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 且中部地区延展性呈收敛态势, 而西部地区延展性呈发散态势, 故东部和中部西区内部绝对差距呈下降趋势, 而西部地区呈现轻微扩大趋势。

第四, 从收敛性来看, 全国层面以及三大区域均存在 σ 收敛和 β 收敛。具体来说, 从 σ 收敛来看, 样本期内, 全国以及三大地区变异系数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 从 β 收敛来看, 无论是绝对 β 收敛还是条件 β 收敛, 全国以及三大地区消费升级水平收敛系数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为负, 即全国以及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均存在 β 收敛。就收敛速度而言, 无论是绝对 β 收敛还是条件 β 收敛, 西部地区 β 收敛速度最快, 其次为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β 收敛速度最慢。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意愿与能力。研究表明，2001—2018年期间，消费升级水平均值处于0.279—0.366。可见，我国消费升级水平存在很大上升空间。2019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8%，低于GDP6.1%的增速。因此，政府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居民收入结构，扩大居民收入来源，提高全社会消费能力；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减轻居民后顾之忧。如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如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缓解家庭负担，提高家庭消费信心与消费意愿；最后，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促进信息消费，培育消费新热点。信息消费改变了居民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不断激发出新的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例如，进一步提升互联网宽带的覆盖范围与速度，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第二，重视区域差异问题，在全局框架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区域内消费升级水平差距。首先，研究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消费升级水平均值分别为0.446、0.267、0.247，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远远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区间消费升级水平差距是构成总体差距的第一来源。因此，政府要深入挖掘引起地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既要保证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持续上升，也要着力加大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倾斜，借助政策优势弥补区域劣势，以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快速提升，缩小地区间差距；其次，进一步缩小区域内消费升级水平差距。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高于中部地区，尽管东部地区内部消费升级水平差距呈现递减趋势，但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基尼系数递减趋势较慢。西部地区呈现相反特征，样本观测期内整体呈现微弱扩大趋势，且其两极化现象严重。因此，政府应该重点缩小东部地区省际差距，并且缓解西部地区两极分化态势。

第三，着力推进消费升级水平发展均等化的进程中，注重区域消费升级水平的收敛特征。本文研究发现，尽管全国以及三大区域均存在 α 收敛和 β 收敛，但其收敛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政府在制定缩小地区间消费升级水平差距的政策时，也要兼顾其与地区间消费升级水平提升速度的协调性。只有当各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发展速度与地区消费升级水平差距协同并进时，消费升级水平才能够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另外，对于消费升级水平较低的区域，更应该从自身出发寻找造成消费升级水平低下的原因，进而从根本改变这一现状，否则仅倚靠政府的政策优势不能取得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 [1]叶立新, 杜玉兰. 试论消费结构升级[J]. 当代财经, 2001, (04):28-30, 53.
- [2]Lluch C. The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73, 4 (1):21-32.
- [3]Deaton A, Muellbauer J.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3):312-326.
- [4]黄隽, 李冀恺. 中国消费升级的特征, 度量与发展[J]. 中国流通经济, 2018, 32(04):94-101.
- [5]孙豪, 毛中根, 王泽昊. 消费降级:假象及其警示[J]. 经济与管理, 2020, 34(03):19-26.
- [6]石明明, 江舟, 周小焱. 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07):42-60.
- [7]刘向东, 米壮. 中国居民消费处于升级状态吗——基于CGSS2010、CGSS2017数据的研究[J]. 经济学家, 2020(01):86-97.
- [8]孙凤, 易丹辉.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J]. 统计研究, 2000, (5):9-15.
- [9]Zhou J. Uncertainty, inequality and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in urban China[J]. Economic Modelling, 2013, 31:308-322.

-
- [10]王雪琪, 赵彦云, 范超.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因素及趋势研究[J]. 统计研究, 2016, 33(2):61-67.
- [11]Cai W, Chen J, Ding H. Medical Insurance Effects on Household Durable Goods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6, 52(2):449-460.
- [12]杜丹清. 互联网助推消费升级的动力机制研究[J]. 经济学家, 2017, (03):48-54.
- [13]孙早, 许薛璐. 产业创新与消费升级: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经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07):98-116.
- [14]张自然, 祝伟.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抑制消费升级了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J]. 金融论坛, 2019, 24(08):34-44.
- [15]方娴, 金刚. 社会学习与消费升级——来自中国电影市场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01):43-61.
- [16]Li J, Wu Y, Xiao J J.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Modelling, 2020, 86:317-326.
- [17]南永清, 肖浩然, 单文涛. 家庭资产, 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升级——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证[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42(08):1-15.
- [18]刘悦, 陈雅坤, 李兵. 收入不平等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奢侈品消费的跨国分析[J]. 经济科学, 2019, (06):30-42.
- [19]姚玲珍, 张雅琳. 家庭债务、金融素养与消费——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0, 35(09):119-128.
- [20]孟慧霞, 陈启杰. 系统观视阈下的消费结构升级[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1, 13(02):91-97.
- [21]张卫民, 安景文, 韩朝. 熵值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问题中的应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3, (06):115-118.
- [22]邓宗兵, 何若帆, 陈钲, 朱帆.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生态文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06):3-25.
- [23]Dagum C.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7, 22(4):515-531.
- [24]梁红艳. 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动态、差异分解与收敛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12):40-60.
- [25]辛冲冲, 陈志勇.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分布动态、地区差异及收敛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 36(08):52-71.
- [26]许坤, 卢倩倩, 许光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消费扩容升级——基于面板模型和面板分位回归数模型的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 (06):28-42.
- [27]Alan S, Browning M, Ejrns M. Income and consumption: A micro semistructural analysis with pervasive

heterogene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126 (5):1827-1864.

[28]韩立岩, 杜春越. 收入差距, 借贷水平与居民消费的地区及城乡差异[J]. 经济研究, 2012, 47(S1):15-27.

[29]李江一, 李涵. 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结构:基于相对收入理论的视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33(08):97-112.

[30]陈斌开, 林毅夫. 发展战略, 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04):81-102, 206.

[31]徐敏, 姜勇.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吗?[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 32(03):3-21.

[32]付波航, 方齐云, 宋德勇. 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11):108-114.

[33]Bacchetta P, Gerlach S. Consumption and credit constraints:International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7, 40 (2):207-238.

[34]臧旭恒, 李燕桥. 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基于 2004~2009 年省际面板数的经验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12, (02):61-66.

注释:

1 《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指数报告(2018)》:“懒人经济”时代到来, <https://www.tmtpost.com/3610929.html>.